

隋唐史与 政治制度 研究论集

徐连达 著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徐连达 新著

关于隋唐两代社会历史等研究的重要论述



隋唐史与 政治制度 研究论集

徐连达 著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徐连达 新著

关于隋唐两代社会历史等研究的重要论述

漓江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隋唐史与政治制度研究论集 / 徐连达 著.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407-7501-8

I. ①隋… II. ①徐… III. ①中国历史—隋唐时代—文集 ②政治制度史—中国—隋唐时代—文集 IV. ①K240.7-53 ②D69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66691 号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 <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21-55087201-833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山东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 960mm×690mm 1/16

印张: 22.25 字数: 460 千字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6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 0539-2925888)

前　言

任何论述历史的文章，无不带有撰作者个人对历史的思考。它总离不开这一时间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思潮。因为人们总是在社会群体中活动着。

我自 1953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后，便留校任教，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从助教始，至教授退休，先后达 40 年之久，对学生讲授过《元明清史》《隋唐五代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中国通史》《通鉴研究》《隋唐史专题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等课程。在这期间，曾编纂过《中国通史》教材（复旦大学出版社），参加过 1974 年版《旧唐书》《旧五代史》的点校工作。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文革以前，我所写的文章不多，其中有评论性的，也有一些应时的，不足称道；文革之后，随着读书研究的时间多了，我刊出的论文也渐次增多，其中有与同事们学生们合作，写过有关隋唐史及政制史的专题论文，这在当时应该说是很时髦的。但我主要是倾力于撰作专著，整理过先师陈守实教授的《中国土地关系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组织过本校历史课教材《中国通史》的编写，参加过编纂《中华名著要籍精诠》并担任社会卷分册主编，以及主编《中国历代官制词典》等。

退休前后著有《中国皇帝制度》（与朱子彦合作）、《中国官制大辞典》（修改增订）、《唐朝文化史》《中国历史的 205 个细节》《大业风云——隋唐之际英雄传》等。大体上对过去的存稿作了一次小结。

今蒙漓江出版社同志推爱邀约，把我过去所撰写的主要论文集结付印，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喜悦的事。倘该书的出版，能对史学界的学术交流起到微小的作用，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徐连达

2014 年 11 月 15 日

目 录

唐朝文化史综论	1
唐人礼法、习俗中的避讳行为及其社会效应	26
唐人的饮酒习尚与酒令	38
中国古代职官制度述略	56
关于隋唐官员的职、散、勋、爵制度	59
隋唐的封爵制度	80
唐代监察制度述论	92
汉唐官吏的考课制度	107
关于中国封建政制研究方法的若干问题	114
唐代军事屯垦及其历史命运	
——兼论屯田与营田	125
隋唐时期的洛阳	139
隋唐时期的洛阳与丝绸之路的关系	166
关于李渊的历史评价	178
唐太宗首谋晋阳起兵吗?	
——关于李渊的历史评价问题	188
论“贞观之治”	
——兼论隋末唐初阶级矛盾与统治阶级政策的相互关系	196
徐坚与丘光庭评传	207
从夏商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的人事制度	215
两汉时期的察举制度	221

两汉的征辟制度及其他	228
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度	234
唐宋科举制度的产生及其发展	240
明清时期科举制度的衰落	248
汉唐科举异同论	255
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几个主要问题	273
论中国封建专制君权的发展趋势	282
“清官”“贪官”优劣论	292
论我国农民战争中的“皇权主义”	294
秦末社会矛盾再探讨	
——兼评秦楚之际农民运动的地方差异性	301
论八思巴在历史上的作用与贡献	311
明代锦衣卫权势的演变及其特点	324
锦衣卫与三法司的关系	338

唐朝文化史综论

—

文化产生于人们长期参加的社会劳动实践。它是社会的物质、精神的载体，有着一个多元的、庞大的复杂体系。它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并受到经济、政治、制度、宗教信仰、道德行为、风俗习惯等等诸方面的影响，文化一旦形成之后，便有其相对稳定性和独立性，并有着自身发展的规律。它继承着前一时代的成果，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使之不断地适应时代的需要。文化的特质便是服务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服务于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求。因之，文化不仅与经济、政治密切相关，同时又作用于它赖以存在的整个上层建筑。封建社会的文化，就其本质来说，就是为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服务。这一点在整个封建社会中是始终不变的。

一个时代的文化并不是凭空地、独立地产生，它系继承着前一时代既成的主流文化而来。这种继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循旧、承袭，而是在发展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有所取舍、有所扬弃、有所创新。在文化的筛选、拣择过程中不断去旧立新——抛弃陈旧的、落后于时代的东西，同时汲取适应于时代需求的新东西。新旧文化的不断交替，组成了文化史中不断前进的发展规律。

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物产丰富、人口繁多的多民族国家，同时周边地区还存在着许多民族国家。东南西北各个地区，华夷胡越各种民族同处于广大疆域之中。由于生产发展的参差不齐，自然地理环境、人文习俗乃至语言文字都有所不同。这种发展程度的差别，必然导致了在文化形态上各自有别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愈往古、交通愈不发达，差异愈大。但是随着地区开发、交通发展，人们接触交往的范围增大，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的交流愈频繁，差异就会逐步缩

小。在此过程中，文化的差异彼此间会发生相互影响。他们总是根据自身的条件，或发生相互冲撞、相互摩擦，或在汲取的过程中进行扬弃，或在统一体中相互包容，乃至最后融合成一体。这一切都是通过本身文化运动方式来完成的。其中最基本的一个原则，便是先进的文化起着榜样的示范作用，后进的文化则向先进的文化学习、看齐。这种文化运动川流不息地贯穿于文化的发展史中。

在文化的统一体中，即使是同一民族，也包含着群体中的各个部分的文化差异性。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阶级社会，各不同阶层的人们对衣食住行的生活方式的需求以及思想、理念、信仰、行为均有大同小异中的不尽相同之处。由此，统一体中的文化就有高雅的与通俗的区别。高雅的文化为统治者所认可、提倡和推行，统治者也用此进行道德礼乐的教化，进行移风易俗。而通俗文化则植根于民间，为广大民众所接受、喜爱，因为这是与他们的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紧密结合在一起，而不可分割。这种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文化彼此有矛盾，但亦有联系。这些也都影响着文化形态的发展进程。从高雅文化来说，当它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一旦与社会现实生活脱节，仅成为一种礼仪上的程式、摆设或作为“故事”时使用，日子久了便会僵化演变成毫无生命力的东西。而从民间产生的通俗文化在开始时虽不被统治阶级认可，被视为平庸、低下，但由于它流行于民间，与社会现实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具有蓬勃发展的活力，最终它仍会被统治阶级所吸收，并通过改造、加工，使之融入于礼乐教化之中。淹滞不前的高雅文化由于融入了民间的通俗文化而增添了新的血液、新的成分，这便使陈旧的不断地得到更新。文化也就得到绵延不绝的发展。这种此伏彼起、新旧更替就是文化发展运动中的动力，并使文化在递嬗演变中永葆新春。

二

中国封建社会自秦汉建立起大一统的王朝之后，历经两千余年。其间以汉、唐、明、清最为强盛。以汉代来说，在文化发展史上是属于初创的开拓时期，其特点是进行政治思想和文化上的统一，逐步消融各地区各民族间的文化差异。汉承秦制，实行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废除世卿世禄，建立郡县，制定法律，继续推行书同文、行同伦、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等工作，在制度上对语言文字和道德行为

进行统一,不断整合以确立规范。汉武帝时,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以儒学作为经世治国的工具,太学设立博士弟子,郡国普遍设立学校,均是以文教治国的最显著事例。到了唐代,在文化发展史上则属于成熟、发达时期。其特点是通过魏晋以后的南北交融、胡汉交会的转型期,文化的统一性再一次得到了加强,而差异性则逐步削弱。它以繁荣、昌盛、灿烂、瑰丽的文化而远扬声名于世界各地,并使大唐文物制度之美成为亚洲的一些国家学习、仿效的榜样。今日人们仍沿称中国人为唐人,中国化的城市建筑为唐城,中国式的服装为唐装,语言文字为唐文。虽然今日各地的华人多是明清以后时期侨迁旅居到世界的华人后裔,其居室及衣冠服饰均已与唐相去甚远,人们所以称呼为唐人、唐城、唐装、唐文,只是表明一种文化形态,但这种以唐名作为标志,亦足以窥见唐文化的恢弘博大及在世界各国的深远影响。

唐文化是一个复杂多层面的综合体。它的内容极其丰富多彩,犹如百花园中盛开的花卉,群芳争妍,备显风姿。它的基本特点是严整宏伟、气势磅礴、瑰丽多姿。它在大方与自信的氛围中把传统文化不断创新,并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高潮。

唐文化就其内容来说可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个大的范围。今就各个方面分别来进行概括论述。

物质文化系指唐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诸方面所表现出的文化形态。衣食是人们生活所需,须臾离不开它。唐人衣食水平已达到封建社会的极致。就衣的方面来说,衣服的原料质地有锦、绮、绫、罗、缬、绚、纱、绢、棉、麻等等,应有尽有。服装形式多样,各类人物的服式,则各据其地位等级而有不同服制上的差别。品官命妇服装鲜丽纷华,各有种种花纹、图饰。品官据其品阶,身上佩带鱼袋,以藏随身物品,质地有金、银之别,袍服服色则又有绯、紫、青、绿之分。士庶人以下则常服白衫、黑衣。时俗对服装的观念是喜新厌旧,花样不断翻新。妇女身着华丽彩衣,头上去簪、髻、帷帽、靓妆露脸、袒胸、窄袖,是唐代宫廷女性装束的特色,显示出形体美已成为时髦,以至富贵人家争相仿效。在长安、洛阳两京及各大都市中,胡服胡装已十分盛行。各色奇异服装充塞市场和街巷之间。繁华的两京几成为奇装异服的盛大博览场所。“士女皆竞衣胡服”以及“女为胡妇学胡妆”,充分说明了唐代士女对服装胡化的喜爱。

妇女化妆的美媚迷人也颇具唐人的时代特色。她们头上的发式多种多样。

高髻、低鬟为时俗所尚。髻的花样繁多，名目就有近百种，皆随意之所好，标新立异。妇女脸面上的化妆有浓妆、淡妆、慵妆、晚妆等。仅以红妆的胭脂品名来说，就有石榴娇、小红春、大红春、嫩吴香、半边娇、万金红、圣植心、露珠儿、内家圆、天官巧、洛儿殷、淡红心、猩猩晕、小珠龙、媚花奴等等美艳动听的品名。除红妆外，又有别出心裁的黄妆乃至口唇涂抹黑色的乌膏。眉目在脸面上最能传神。由此女子们对眉妆亦十分用心。浓眉、淡眉、长眉、短眉、八字眉、柳眉等名目众多。宫廷和教坊女子画眉乃至每日画出一个新样，以此招惹人们注目喜爱或消遣春光。在脸部化妆中还有在两眉之间贴花子，称为花钿。在面颊两旁用丹青、朱红等色彩妆点出似钱、似星、似弯月等式样的“妆靥”。这些都是用来增添脸面迷人的彩晕，反映了女子们“为悦己者容”的爱美心理。有些女子还追逐新奇，高髻、险妆、去眉、开额，故意妆弄出怪异的样子，这就有点惊世骇俗了。

以饮食而言，唐代饮食因地域不同、嗜好不同，各有特色。北方食麦粟、牛羊等陆产。南方食稻米、虾蟹鱼蚌等水产。但南北东西已渐趋统一。南方的稻米已大量运输到北方长安、洛阳等地，供广大都市居民消费。食肴原料来自全国各地，山珍海味，各色齐全。尤其讲究刀法工艺和烹饪，追求色、香、味兼美。美食家们精心设制出种种名目新奇的名菜、名点，以及精雕细琢、色泽鲜艳的各色看盘。宫廷和民间有各种食谱，记录名肴、名点的制作和烹饪方法。享受口腹之美是唐代王公权贵们所孜孜以求的欲望。唐人还喜欢胡食，引进了不少来自异邦远国的特殊制作方法。著名胡食有筚锣、油饼、搭纳等。史称开元以来，“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可见一时风气之盛。这些都丰富了唐人饮食文化的内容。

酒、茶是唐人的主要饮料。唐代人人爱酒，上下同欲。无论在繁华的都市或僻远的村社，人人都爱饮酒。文人间的交往可说是无酒不成诗，无酒不成交。在宴会上，有歌舞伎陪酒、劝酒，还行种种酒令以增加宴会的乐趣。各地所产名酒甚多，酒名且多带有“春”字，这是其显著特色。如乌程若下有“若下春”，河南荥阳有“土窟春”，富平有“石冻春”，剑南有“烧春”，云安有“松醪春”，宣城有“老春”，杭州有“梨花春”，金陵有“金陵春”等。酒的饮用据时令风俗又有元日饮“屠苏酒”、寒食欲“酴醿酒”、端午饮“菖蒲雄黄酒”、重阳饮“菊花酒”等。酒的色泽，则有红、绿、黄、白、碧、青、紫，诸色纷呈。又酒有用水果或香药制成的露、浆、醪、醑、觞、汤等各种名称，从波斯传入的“三勒浆”以及西域传入的葡萄酒则

更负盛名，是当时最名贵的酒。唐人还十分讲究饮料用具。精美的酒具用玛瑙、琥珀、玳瑁、琉璃、象牙、玉、金银器制成，形状和雕琢均十分精美。盛酒用具已从前代大容量的樽，转变到造型精巧细致的杯、盏。胡人的酒具金叵罗和酒胡子常常见于酒宴上。酒胡子雕刻着状貌似胡人深目高鼻的样子以指挥酒令的赏罚，引人联想发噱。

唐代饮茶之风已从南北朝时期限于江南转变为普遍盛行于全国。无论僧道雅俗，都喜爱以饮茶提神消渴。文人雅士们饮茶，颇讲究茶艺。精选名茶，注意火候，盛以精美茶具，细酌品味。唐中叶茶博士陆羽著有《茶经》一书，记录茶的性状、品质、产地、采制、煮饮的各种方法以及所用器具，是我国第一部关于茶的专门著作，人们誉之为“茶神”。有些嗜好饮茶的文士还一一品味各地山川之水，论其质地，分别等次，逐一介绍品评。讲究饮用水及茶道、茶艺已成为文士们的清趣。

以居室建筑而言，唐人对居室崇尚高敞、宏大、壮丽，并配置有供休闲赏玩的园林式别墅。亭台、楼阁、池榭、花卉草木错落分布在园苑之中。在喧闹的城市中散布着一股清逸怡情之趣。权贵之家则不惜以重金翻旧建新，高檐重瓦、雕栏玉砌，在求新中不断追逐工巧奢丽已成为时髦。裴度在洛阳的绿野堂、李德裕在伊阙的平泉别业、白居易在东都履道里的园林别墅、王维在蓝田的辋川山庄等都是城乡中居室建筑的典型代表。唐代的城市建筑尤以长安、洛阳两京的设计构建名闻中外。长安城系承隋大兴城而来。事先有精密的规划，布局严整，突出体现了皇居所在的政治理念。自北而南，由宫城、皇城、外郭城组成。宫城为皇帝居室及朝会之地，有东内、西内，高宗时以大明宫为中心，含元殿为百官朝会之所。东西南北，殿阁相望。东面有东宫，以居储君，西面有掖廷宫以居宫女。宫城之北有广袤的园林以供游猎赏玩，亦寓有隔离外界、保障禁廷安全的用意。宫城南面的皇城为朝廷百官衙署所在。皇城南侧依传统的“左祖右社”规制建有祖庙和社稷坛以供帝王就近祭祀。外郭城布列在宫城、皇城的东西两侧及直南地区，分置一百余坊，为官民住宅。其间坊巷栉比、整齐划一犹如棋局。外郭城东、西、南各置三门，九门各有门道，分别左右，备行人出入。中门道则为朝廷专用，平时不开。又宫城正南有开阔的大广场，可聚万人以上，皇帝在宫城上发布重大诏命，或逢喜庆之日，便在这里表演歌舞杂技，表示君民同乐。外郭城以朱

雀街为中轴线，直北对宫城之南，街道最为宽阔，间距约有一百五十米。两侧植有槐、柳，人称天门街。皇帝御驾外巡，通常由此出入。外郭城其他主要街道，宽度亦在百米以上，极便车马往来。长安城的雄伟壮丽及其齐整布局，突出地表现了以帝王为中心的政治文化色彩。

长安城中还建有大小不等的寺观庙宇，数目多达百余所。大寺庙如西明寺、龙兴寺、大慈恩寺著名中外。建筑宏大瑰丽，佛塔高耸。大庄严寺、大总持寺塔高均三百余尺，上接云霄。保留至今的大慈恩寺塔和荐福寺塔俗称大小雁塔，即是唐塔的遗存。

唐代对官民居室的建筑面积及装饰均有规定，等级的区别十分明显。豪华简陋有天壤之别。富贵人家居室内部陈设十分奢华。日常用品家具有床、榻、桌、椅、凳，床上用品有枕、被、褥、帐，陈设有幔幕、屏障，墙上且绘有壁画。居室的装饰体现着各种等类的人们对人生的理想及其审美观念。唐人的起居由两汉以来的跪坐发展到类似今日直坐，由此所用床榻椅凳等系列家具皆由低矮而增高。这是起居卧坐变化的一大特点。

以道路交通而言，唐代水陆交通超越前代。道路有供帝王专用的御道。陆行有驰道，秘密出行有夹道，各地向朝廷运送贡物有贡道，供使臣出使递送有驿道，长安城中，且有专为宰相大臣专用的沙堤，便于上朝时使用。官修的大道开阔，可驰车马。大道两侧，各植树木。近道有驿馆、旅舍，以便官民行旅止顿，随时供应酒食住宿及租赁车驴等交通工具，公私皆得其宜。其水陆交通路线则以长安、洛阳两京为中心，向四面八方扩展。地方则以府、州为中心，向毗邻的州县延伸，构成了由中央到地方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体系。交通的大动脉陆路以驿道为主干，若中央与地方有紧急军情传送，一日可驰行五百里。水路则以大运河为主干，绵延直达洛阳的中心点，再经河道，西至广济渠，西及于长安。各地的特产、土资源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京都，以供朝廷及官民的消费。此外，在周边地区则辟有通四夷的道路，西出阳关、玉门关至西域。东出辽水以东至渤海、高丽。南至交州、广州以通海夷。北出塞外之地以通突厥、回纥。西南经吐蕃以至尼泊尔、印度。通四夷的道路皆遍置驿馆，以供行李之需。故唐代驿馆的设置十分发达。通常三十里置一驿，驿置驿长、驿卒，以接待往来使人。驿馆构建宽敞，馆内多有沼池园林，供使人休息，备有酒、茶、食物，供使人饮食，车马舟船，供往来交

通。但使人出行必须持有官方发给的驿券作为凭证，驿馆则按照官员品级定额供给。至于士民、商贾、僧道若跨州越县出境旅行、经商，或求经拜佛，均须持有官府发给的文牒，每到关津渡口，均须出示文牒，有司验明正身及从行人数、物品，才能放行。都市中城坊居民夜行有禁，在规定的时间内开闭坊门。不得擅自出入。坊中居民的夜生活通常只能在坊里居室之内进行。这些都标志着朝廷对官民出行的控制。其目的是防范不轨，保障社会秩序的安定。

以家庭和社交而言，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结构，也是人们生活的出发点，凡人生的生、老、病、死、吉凶、婚丧，乃至社会交往无不与家庭有密切关系。唐人的家庭组合，通常以父母、子女合为单个家庭。家庭血缘关系的扩大则为家族。家族聚居在一起生活，则由各单个家庭组成为复合体家庭。或共财同炊，或分财异炊，视不同情况而有异。家族内部则以家长制为核心。大家庭中妾婢童仆则寄附在户籍之内。家族中五服之内有男女亲疏尊卑上下的等差。在家族关系中通常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作为维系，尊祖重孝、分别嫡庶亲疏是家庭关系的基点，礼教则是约束思想行为的有力工具。一些名门大族，重视礼教，且立有家规、家范、家教、家诫以教诲子弟，约束众人。婚丧之际，则据礼俗行事。大家族的尊长还对本族族人有赡养周济、教育和提携的责任。家族的扩大则为宗族。同宗共祖者若易地而居，远迁外地则彼此分房，各有地望。为标榜门第、联络亲谊，则有家谱、族谱以记录其源流及分支情况。

唐人婚姻极重门第。崔、卢、李、郑、王、韦、杜、薛、柳等等都是社会地位显赫的名门世家。仕宦之家婚配必挑名门望族相配。娶妇若得崔、卢二姓则认为一生无憾。故旧门世家嫁女，必高求聘财，世俗称为“陪门财”。妆奁之资即使千金亦不为多。

唐人婚姻方式多样，有官婚、收继婚、入赘婚、典卖婚、掠夺婚、借吉婚等。唐代皇室先世出自鲜卑，后裔保留着部分鲜卑遗俗，对收继婚不以为耻，妇女再嫁习以为常。又唐代蕃人亦有娶华人女子为妻，是为唐蕃通婚。但主流方式仍是传统的男娶女嫁，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士大夫守礼之家通用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礼进行。民间则多从简约。迎亲在六礼中最重，有种种繁多的礼俗。主要有催妆、下婿、障车、跨马鞍、传席、合卺、撤帐、却扇等等。唐代是个等级社会，人们由于身份不同，婚配亦有种种禁限。其基本精神便是良贱有

别，当色为婚。如音声人、乐伎身在乐籍，只能同类相配。官户、杂户不得娶良家女为妻即为其例。在丧葬方面，唐人对亲人死亡是“事死如事生”，礼俗十分看重。通常行棺木葬。在入土前有殓、殡、葬三个过程。亲属根据亲疏关系须服丧服。若父母死，则须服三年丧。在此期内不得娶妻生子，不得求官入仕。在官之人闻丧后亦得辞官回家守孝。入殓后的出殡送葬礼俗最受重视。富贵人家大讲排场，路祭长达数十里，送葬仪物雕镌饰画，穷极奇巧，馔具、牲牢、祭盘、帐幕弥天盖地。民间亦不惜荡家破产以办丧事。此外丧葬的基地、墓式、物品、墓碑、墓志铭等也都有等级差异。官民之间，差别很大。大官僚家有家庙，四时祭享。平民百姓只是每到清明时节往墓地烧纸钱、祭扫奠拜而已。

以社会交往而言，称谓反映人们的社会关系和文化气息，同时也表达人们对生存的一种愿望与祈求。唐人称谓极为复杂，不能细说。通常对男子称呼多称郎、郎君；对女子多称娘、娘子。同辈之人，彼此称兄道弟，各以排行相呼，以表示亲昵。同族间如此，扩而大之亦流行于社会异姓的朋辈，通常是在排行上加姓氏，或加官号。如李白排行十二，称李十二，刘禹锡排行二十八称刘二十八。柳宗元有《同刘二十八哭吕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侍御》的诗题，即可见时尚一斑。这种称谓可说是唐代独有的风俗习惯。又唐人极看重亲谊、族谊。同祖共源者可以合谱，同族者可以相互攀附。人们为寻求自身利益，多有借亲故关系结交，有些人且不惜弄虚作假，伪造门第谱系，乱拉关系，这些都是流行的社会习尚。又唐人在社会交往中极重礼数，相见时唱喏作揖，行途中逊让避道，参谒时盛行名刺，避国讳、家讳则成为社会礼俗中最普遍的现象，它是尊祖重孝观念在称谓上的反映。

以学校和科举而言，唐代士人是社会中具有一定地位的知识阶层。他们终生以入仕做官为准则。入仕之途有二：一是学校，二是科举。唐代学校普遍受到社会重视。中央设国子监总领全国教育。国子监下属有国子、太学、四门、书、算、律六学。前三类以读经通才教育为主，书、算、律学则为专门技艺而设。玄宗时又置广文学，专为考进士而设，是为七学。地方则有官方所办的府、州、县学。中央六学各有学制规范，从人员设置、招生对象、年限、学习内容、考试、休假以及毕业后的出路均有详细的规定。其特点是体系完备，详明有序。除官学外，民间又有私学。著名的私学由儒学大师开业执讲。乡里中则有私塾，聘有塾师。家

庭中通常由尊长亲自教育子弟。其目的都是为了教育子弟，谨守礼教孝道，知书达理，并以经学、诗赋、文章取得官位以光耀门庭。故唐代学校教育极为发达。人们父教其子、妇劝其夫蔚然成风。即使是三尺童子亦以不识文墨为羞耻。

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场所，但入仕做官还须经由种种途径，其中以参加科举考试为主要通途。科举即贡举，它是由地方州县长官推荐本境优秀士人到中央参加礼部试，及第后再经吏部试选拔进入仕途的一种方式。科举所设科目，以明经、进士为主。明经重经学，进士重诗赋文章。读经死记硬背即可，但诗赋文章须凭真才实学、个人禀赋，故进士科尤为人们所看重。进士及第，很快便扬名天下，人们称为“跃龙门”“折桂枝”，为入仕做高官的必由阶梯。

推行科举考试是唐代选拔人才的最大特点。它放弃了魏晋南北朝以来以九品中正选士的传统方法，改变为经层层的考试由中央取舍人才。它是一种推荐与考试相结合的方式。士人们不必全凭家世、出身，只要勤奋学习，知书能文，就可以报考求仕。考试的公开化打破了门阀垄断仕途的传统局限，同时也产生激烈竞争，从而激励并焕发了士人汲汲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考试重诗赋、文章和讲求书法之美，形成了诗歌和书法艺术的高度发展。但是在另一方面也使得传统的读经、敦厚朴实的学风荡然无存，从而产生了崇尚奔竞浮华的士风。士人们崇尚交游，彼此推敬，激扬声名，投刺求谒于主司和权贵之门，讲交情、拉关系、攀亲故、走“终南捷径”成时代风尚。官场上的结党营私、朋党之争，亦无不与科举有关。

以学术文化而言，唐代自太宗贞观以来，即大兴文教，曾多次对图书文籍进行过大规模的收集和整理，到玄宗时期达于高峰。弘文、崇文二馆、国子监及集贤殿书院均藏有大量图书，经、史、子、集著作充盈府库。唐代仍以儒学为宗。儒学的经典注疏《五经正义》，经过综合整理，陆续问世，成为士林必读之书。除经学外，老庄玄学及佛学大小乘诸经论疏的翻译亦大力展开。此外，史学、地理学、数学、天文学、医药学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史学著作有由官方组织编纂的自《晋书》以下到《隋书》计八部之多。还有刘知几的《史通》、杜佑的《通典》则是史评和政典类的代表作。地理学有李泰及其门人编著的《括地志》和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均是鸿篇巨著。数学有李淳风等编定的《算经十书》为六学中算学的必读教材。天文学有李淳风的《法象志》及僧一行的《开元大衍历经》，

是研究天文历象的名著。医药学有孙思邈的《千金方》《千金翼方》及官修的《唐本草》。诸此等等都是在实践中稽考群书，总结前人成就所撰成的划时代著作，反映出当时最新的学术文化水平。

木版雕印的印刷术，在唐代已使用。晚唐时流传甚广的佛经和生活用书日历已用雕版印刷。五代时卷帙浩繁的正史亦用雕版印行。这对学术文化的发展起着促进的作用。

唐代文学上最大的特点是文体由骈入散和诗歌的盛行。骈文盛于六朝，至唐官文书诏令及百官奏议仍沿用四六体裁。词藻堆砌，流于浮华。散文经初唐陈子昂到独孤及、梁肃、韩愈、柳宗元、李翱等人的不断提倡、推行，日益成为时代潮流。诗歌是唐文学的瑰丽奇葩。题材广泛，风格多样。无论官僚、士人、僧道、优伶无不以诗歌自鸣。清人所编的《全唐诗》，收诗近五万首，作者二千二百余人，仅是沧海一粟，其湮没不传的，难以计数。此外，传奇小说也是唐文学的重要成就之一。它的内容已摆脱了六朝以来宣扬神怪诡异的狭窄圈子而深入到社会各层面，其体裁则是文备众体，反映出士人的史才、诗笔和议论。到了唐后期，流行于民间用于歌唱的长短句（词）及都市中讲故事的俗讲变文则成为新兴文学的新秀。

以宗教信仰而言，唐代把儒、释、道列为三教，认为三者皆可以为国家所用。儒教在思想上虽占正统地位，但社会上却十分崇尚佛道神仙。唐统治者一方面推崇道教为国教，建老子庙、立崇玄学，注释《道德经》并大加崇扬，另一方面也广建佛寺、翻译佛经，礼遇佛学大师。同时，还常在宫殿中举行三教论衡，使彼此论难后归于统一。由于统治者提倡，佛教各派林立，天台、华严、密、律、净土诸宗皆盛极一时，阐释佛教教义的经论注疏汗牛充栋。重译、新译、全本、简本一概齐全。总集《大藏经》的问世，标志着佛教论著的鼎盛。虽然由于佛道斗争，武宗朝一度命令灭佛，但在他死后，佛教很快地得到恢复和发展。

唐代并不排斥外来宗教。随着大批域外人士的来华，也带来他们各自信仰的宗教。中亚及西亚所信奉的伊斯兰教、景教、摩尼教、祆教等均流传于两京及全国各地。诸教各建庙宇祭坛，宣扬教义。唐代可说是诸教并存、各行其道的时代。不过这些外来宗教，仅在各族内部狭小圈子里流行，对唐代社会的影响无法与佛、道相比。

唐代民间还流行着种种迷信与禁忌。由于人们普遍相信世间有鬼神的存在并主宰着世人的吉凶，故迷信、禁忌十分流行。凡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婚嫁丧葬均有种种禁忌。看相、占卜、说梦、看风水、选日子、建屋宅、择葬地等等便是迷信、禁忌在社会上流行的几个主要方面。

以书画雕刻艺术而言，唐代书法、绘画艺术亦日益精妙，人才辈出。初唐书法宗艺二王，国子监所隶有书学，专习历朝名人书法。初唐书法家有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人称四大家。继之者有陆柬之、贺知章、张旭、李邕、颜真卿、怀素、郑虔、李阳冰、柳公权等等。他们或工真行，或擅草书，或精篆隶，或不拘一格，诸体兼通，皆扬名于世。其中张旭有“草圣”之誉，颜、柳书体，则为后人临帖的楷模。唐代还有一批供职于衙署的抄书手，他们楷书书法工整、遒丽，亦足见一代的时风。唐代图画有壁画、卷轴画。前者多图画于宫殿、庙宇、广厦的壁间，规制恢弘巨大。后者体制较小，可卷可挂，灵活自如。唐画家先后相继不绝，各擅专门绝技，仅《历代名画记》所载武宗会昌以前就有二百零六人。著名者有初唐阎立本善画人物，绘有秦府十八学士图、凌烟阁功臣图、步辇图等，是一位“人称其妙”的写真专家。玄宗时吴道子画佛经故事与地狱变相于两京各大寺庙中，其诡怪神异令人观之毛发悚然。他又与李思训同画嘉陵江山水于大同殿壁，彼此得山水之美而又各有千秋。王维自画其山庄辋川图，尽收山川之美妙于图中。此外薛稷画鹤、边鸾画孔雀、韩幹画马、戴嵩画牛、李元婴画蛱蝶均专工一技，他们皆临物写生，潜心默会，得其神态飞动变化之妙。壁画遗留至今最著称的是敦煌莫高窟壁画所画的佛教故事。其中飞天形象凌空飘舞，宛若飞仙，尤令人赞绝。此外，在雕塑方面，莫高窟千佛洞、洛阳龙门石窟群中的佛像可说是石刻雕塑中的瑰宝。其中菩萨造像端庄秀丽、慈祥而又丰腴健美，饶有人间少女的风趣。其他石刻如昭陵六骏，以及泥塑三彩陶马，神态栩栩如生，都是雕塑中的典型代表。

以音乐、歌舞而言，唐代娱乐活动多样，其中以音乐歌舞最为盛行。歌有长歌、短歌，因其歌声而入曲调。曲有大曲、小曲、法曲、曲破，各有律度节奏。乐曲名目繁多，有上百种之多。统称则名为歌曲词调。舞据舞姿，有文舞、武舞、健舞、软舞。乐器有箫、笙、笛、篪、筚篥、埙、方响、琴、瑟、筑、筝、琵琶、箜篌、钟、磬、鼓、钹等等，应有尽有。伎乐人员统称音声人。中央官府机构有太常乐工，宫廷